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查理·柯克之死与美国大学的“文化战”

郭英剑

9月10日,正在美国犹他山大学演讲的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被一颗子弹击中身亡。一个本应以言说为武器的空间,被这一声枪响打破。这不是孤立的恶行,它折射出了美国大学作为公共理性的工作坊,已经滑入了“情绪优先、身份先于论证”的泥沼。对美国大学有观察的人不难发现,多年来,美国大学中赞成以暴力阻止演讲的比例在上升,课堂自我审查已成常态。这次枪击事件带来的惊惧,不过是全美高校现状的缩影。当辩论被驱逐、程序被漠视,大学便由“缓冲器”沦为“放大器”。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美国大学中的言论生态是如何断裂的。左右两派的冲突叙事是如何演进的。更重要的是追问如何以“暴力零容忍”表达边界、程序可预期”三条底线,把“文化战”引回到“思想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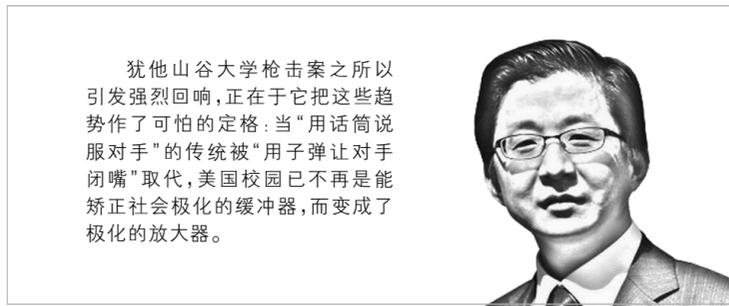
一所“开放入学”的州立大学被推向聚光灯

犹他山大学位于美国犹他州奥勒姆市,是犹他州在读人数最多的公立大学,长期以“开放入学、职业导向、社区联结”为定位,学生中有相当比例为家族第一代大学生,校内社团与公共活动极为活跃。正因这类“开放”气质,犹他山大学近年来频频承办外部演讲与校园辩论活动。

9月10日中午,美国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联合创始人查理·柯克应犹他山大学学生社团之邀,在校内露天剧场发表演讲。按照原定计划,他将一如既往地摆出“反驳我”的桌台,与反对者近距离辩论,继续其在各地校园倡议“用言论对话、以观点交锋”的惯常做法。活动由犹他山大学的“美国转折点”学生分会发起、组织及宣传。

然而,意外突至。一名枪手从远处屋顶开枪,柯克颈部中弹倒地,送医后不治,终年31岁。案发后,警方很快锁定并遣到重罪指控。对于“为何在光天化日、公共空间,对话型活动中仍会发生致命暴力事件”,网络舆论与校外社群都表示震惊。

事发后,犹他山大学举行烛光悼念,校长与学生领袖呼吁“以团结与关怀回到校园”,并强化心理辅导与安全沟通机制。校方在随后一周中发布“欢迎你们在关怀中返校”的信息,披露复课时间表,临时安保措施及面向师生的资源清单,试图在不让“恐惧支配校



犹他山大学枪击案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正在于它把这些趋势作为了可怕的定格:当“用话筒说服对手”的传统被“用子弹让对手闭嘴”取代,美国校园已不再是能矫正社会极化的缓冲器,而变成了极化的放大器。

园”的同时,正视大规模活动的安全边界。

对犹他山大学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公共安全事件,更是一次制度压力测验:在“欢迎争鸣、保障表达”的办学承诺与“防范极端个体暴力”的现实之间,如何重建稳定的程序?如何在不以“安全”为名取消异见者平台的同时,真正把“可预防的风险”降到最低?而美国社会所发出的追问更为尖锐:如果一个以“当面对话”为形式的活动都需要以生命做注脚,那么大学的辩论传统还能不能继续?

校园极化、容忍度下滑与“暴力正当化”的蔓延

美国大学中,保守与进步的光谱在校园的撕裂绝非始于今日。过去十余年间,美国高校的公共空间日益“政治化”:课程与社团被贴上“左/右”标签,演讲邀请沦为站队信号,管理层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反复摇摆;“讲台-广场-社媒”的回声反复叠加,使校园从学术共同体滑向身份政治的前哨。

今年9月9日,美国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发布的《2026 高校言论自由排行榜》显示,被评估的 257 所院校中,有 166 所整体得分不及格,显示出校园言论生态“整体偏冷”。更令人瞠目的是,在受访的近 7 万名学生中,居然有 1/3 的学生认为,“至少在极少数情况下,用暴力阻止演讲者发言可以接受”,该比例攀升到了历史高位。

“容忍度”的坍塌不仅体现在“暴力观”,也体现在“程序性干扰”的普遍性上。上述调查显示,赞成“起哄压制”与“封堵入场”的比例也刷新了纪录。美国《高等教育内幕》对该榜单的解读也指出,赞成“有时或总是可以使

用暴力”的比例已升至 15%,较 2021 年翻了一番,构成对校园治安与学术秩序的双重威胁。换言之,部分学生把“我讨厌这位演讲者”与“我有权剥夺其发言资格”混为一谈。

“自我审查”同样在扩散。根据历年数据呈现,在课堂讨论、与同学或教师交流中,选择“经常自我噤声”的学生比重持续处于高位,2024—2025 两年的多组测量都给出接近“1/4 到近三成”的区间。这意味着,课堂在相当程度上正从“可试错的思想工作坊”退化为“谨言慎行的舆论场”。长期后果是,学生更少学习“与不同立场者理性交锋”的能力,因回避冲突而放弃论证训练,最终将公共对话外包给情绪与算法。

需要指出的是,极化并非单向,左右光谱双方在“容忍彼此的演讲者”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数据并不支持“某一方面压制一切”的简单神话,而更像是“互相扣动扳机”的现实真相——学生倾向于用“道德身份”先于“事实与逻辑”来判断对话是否值得发生;管理层在“秩序/名誉风险”与“自由/学术使命”之间摇摆;公众舆论则常把个案当作意识形态动员工具——进一步放大对立,侵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

犹他山大学枪击案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响,正在于它把这些趋势作为了可怕的定格:当“用话筒说服对手”的传统被“用子弹让对手闭嘴”取代,美国校园已不再是能矫正社会极化的缓冲器,而变成了极化的放大器。

“美国转折点”会推动美国大学“向右转”吗

“美国转折点”创立于 2012 年,由当时尚未读大学的查理·柯克和比尔·蒙哥马利在位

于芝加哥郊区的一间车库里创立。十余年间,它在全美高中与高校铺设分会、举办保守派青年峰会与巡回辩论,逐步成为校园保守主义的主力载体之一。其策略强烈依赖“社团网络+内容媒体+线下动员员”三位一体。

柯克遇害后,“美国转折点”出现“逆风扩张”。据该组织发言人与多家媒体披露,短短一周多时间,参加该组织的意向人数与咨询量“突破 5 万”;与此同时,董事会确认由柯克遗孀埃丽卡·柯克出任首席执行官,承诺“使命不停”。

那么,“美国转折点”能否推动美国大学“向右转”?短期看,它更可能放大“右翼组织密度”与“右翼叙事能见度”,使保守派学生敢于走到台前、设桌辩论、申办场地;同时,其主张所引发学界的自由与审查之争,将会迫使校园管理与学术共同体反思“批评与抹黑”的边界。中长期看,决定美国大学走向的,仍然是规则而非立场:如果高校回到“程序中立+表达最大化”的轨道,那么“向右转”与“向左转”都将退居次席;倘若高校继续以行政尺度差别对待不同立场的叙事,那么任何一方的“扩张”都只会在“零和叙事”里互相正当化,进一步降低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

“堪比国葬”的追悼

美国东部时间 9 月 21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格伦代尔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柯克追悼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知名企业埃隆·马斯克都现身追悼会现场,媒体形容其规模与安保“堪比国葬”。它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以国家级规格悼念一位以辩论为业的青年政治家,既是对“枪口对言论”的公开谴责,也是对“在校园恢复对话”的再度动员。

然而,象征并不等于机制。大学的“向哪儿转”,不可能靠一次仪式决定。左翼理念在美国校园的深刻影响,既与学术社群的历史谱系有关,也与学院治理的制度偏好有关;要“尽快消除其对青年的影响”,并不现实。在我看来,真正需要“纠偏”的是,当“暴力可以偶尔被接受”成为 1/3 学生常见的观点时,大学的第一要务不是“左右归队”,而是“程序归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克之死既是悲剧,也是拐点:如果高校、学生与社会能以此为契机,重申“暴力零容忍、表达有边界、程序可预期”三条底线,并以可量化的执行与透明度来兑现承诺,那么美国校园仍有机会把“文化战”熄火为“思想战”,把“动员式正义”转换为“论证式共识”。

“饱和式研究”无益于人文社科原始创新

刘爱生

当前,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紧跟政策热点或社会热点做研究。以“自主知识体系”为例,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知网上收录的“篇名”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章多达 1210 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在这 1000 余篇论文中,既有在普遍意义上探讨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也有在一级学科意义上探讨的,甚至还有研究深入到二级学科。换言之,国内有关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可谓“全覆盖、无死角”。而且,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就发生在最近两三年内。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几年大火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一个词“饱和式救援”,即为确保目标实现而不计成本投入远超所需资源的救援方式。套用到本文,可以用“饱和式研究”来概括短时间内不计成本地对一个热门主题进行狂轰滥炸式研究的现象。

生成机制

探究饱和式研究的生成土壤,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学术评价体系的量化倾向。现行评价体系如职称晋升、绩效考核、人才“帽子”评选等通常过度量化,强调短期内的项目数量或级别、经费数额、核心或顶刊论文发表量、成果批示或采纳等显性指标。显然,热点领域“变现”快,更容易发表、更容易获得项目、更容易满足考核要求。在这种量化评价体系下,学者们纷纷追逐“热点”,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饱和式研究。相对而言,冷门基础研究明显“吃亏”,它需要长期积累、风险高、成果产出慢且可能不易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在现行评价体系中处于劣势。

其次是学者对应用性研究的青睐。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对社会和国家有实际的用处,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这种文化基因影响下,人文社科学者更倾向于从事有用的、立竿见影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很容易将大部分学者的目光引向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热点议题,进而造成研究选题的同质化和研究内容的饱和化。此外,政府和公众也期待学术界能提供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这种强烈的外部需求会引导研究资源向“痛点”“热点”集中。例如,

国家社科基金、部委和地方政府项目等往往紧密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设定选题指南。这种科研资源配置机制,再加上学者们的研究取向,无疑会助长饱和式研究的生成。

最后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结构性压力。这种结构性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发表与认可的压力。学术期刊为提高引用率,往往会对新兴热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给予更多关注和发表机会;学者们为了快速建立学术声誉、获得同行认可,往往会第一时间追踪热点并快速发声,否则就可能掉队。二是“学术潮流”与模仿效应。面对海量文献,学者,尤其青年学者倾向于选择已有大量研究基础、资料相对丰富、方法论相对成熟的热点领域作为切入点,降低研究风险和成本;同时,当其他学者看到同行因研究某热点而快速获得项目、发表、晋升和声誉,会产生强烈的模仿和跟随效应。这两股压力都易催生饱和式研究。

负面效应

当政策热点或社会热点出现时,饱和式研究往往随之发生。追踪热点本身没有错,它有助于提升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避免学者们自娱自乐、闭门造车。但问题是,当大部分学者停下手头原有的研究,一窝蜂地追热点,其负面效应也就随之而来。

其一,学术质量滑坡。饱和式研究往往追求速度和数量,代价是研究深度与严谨性的削弱。例如,研究设计趋于简化,理论构建流于对政策话语的复述或套用既有框架,缺乏原创性的概念提炼与批判性反思。其结果是大量“学术快消品”充斥学界——表面繁荣却内容同质、思想贫瘠。这不仅浪费学术资源,而且导致针对中国复杂实践的理论解释长期停留在表面,难以形成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原创知识体系,造成实质性的“理论空心化”。

其二,学科生态失衡。在饱和式研究的背后,资源与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少数热点领域,这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学术生态失衡。基础理论研究、冷门方向、长周期探索性课题因缺乏“热度”而面临经费萎缩、人才流失、发表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形扭曲了学科的自然生长,抑制了多元化学术脉络的生成。同时,热点领域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会引发恶

性竞争,导致低水平重复研究泛滥,真正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创新思想或因非主流而被埋没,或因需要长期钻研而被边缘化。

其三,学者发展陷阱。对年轻学者而言,被迫卷入饱和式研究构成“发展陷阱”。为满足“非升即走”或职称晋升等严苛考核要求,他们不得不优先选择能快速产出的热点议题,牺牲个人长期学术志趣与深度研究方向。这不仅可能导致其学术身份模糊、难以形成独特专长,更在职业早期就强化了功利导向的学术习惯。对资深教授而言,卷入饱和式研究可能稀释其学术领导力,损害学术声誉,甚至因仓促研究面临数据、方法或结论上的伦理争议。

其四,社会服务效能弱化。表面上看,饱和式研究形成的一个原因是“经世致用”的思想。但由于前面提到的几点原因,饱和式研究模式下生产的知识未必真正“有用”。事实上,在当前的热点研究中,不少论文难以触及复杂社会问题的深层结构与矛盾根源,提出的对策建议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景方案。更严重的是,方法论缺陷或结论偏颇的研究一旦被迫政策采纳,可能带来不可见的负面后果。此外,学术界过度依附政策话语,丧失独立批判视角,使其难以担当起社会“清醒头脑”的角色,无法为决策提供真正具有预警性、反思性的多元智力支持,长远来看,反而会损害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with 包容性。

超越之道

当下,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特别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背后反映的是对原始创新的强烈渴望。需要承认,我们研究中所采用的基础理论,绝大部分为外国学者提出来的。显然,饱和式研究恐难以实现原始创新的目标。因为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往往意味着不走寻常路,而且很大概率是一条未知之路、冒险之路、孤独之路。因此,在追求原始创新的征途上,不太可能出现饱和式研究的现象。鉴于此,我们亟须改革以超越当前愈演愈烈的饱和式研究模式。

第一,重塑学术评价体系。现行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数量、项目经费、期刊等级等易量化指标。改革须建立多维分类评价机制。其一,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分类评价。

基础理论探索重点考察其概念创新性、逻辑严密性、学科奠基价值及长期影响力;应用对策研究则侧重政策转化实效、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及跨学科整合度。其二,推行代表作制度。推行代表作制度是破除“唯论文、唯数量”学术积弊的关键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降低数量权重,要求学者提交 1-3 项标志性成果,由国际和国内同行评议其原创贡献。其三,鼓励长周期研究。长周期研究是指需要多年甚至数十年持续投入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学术探索,其核心在于尊重知识生长的自然规律,允许学者在长期专注中沉淀思想、反复验证、孕育原创。这要求高校延长评价周期,建构“时间友好型”评价体系。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资源高度向政策热点倾斜是饱和式研究生成的物质温床。改革必须优化学术资源配置,其一,设立长周期的“种子基金”。政府和学校为原创设想提供小额启动资金,允许“高风险、高潜力”课题试错。同时,对重大理论攻关项目给予 10 年期资助,免除中期考核的发表压力。其二,建立冷门领域保护机制。对濒危学科及非主流学派实施定向资助,避免知识谱系断裂。其三,完善学术期刊选题机制。当前,学术期刊热衷于刊发热点文章,这极不利于学术成果的百花齐放。学术期刊应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和学术公器,亟须改变“热点依赖症”,推动学术生产从“追逐流量”回归“创造知识”。这既需要期刊建立更严苛的学术筛选机制,也需国家层面通过评价改革切断热点与资源的强制关联。

第三,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文化。原始创新往往是一条未知之路、不确定之路。因此,营造一种自由探索、宽容失败的学术文化,对于打破饱和式研究模式极为重要。改革可以考虑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重构学术交流生态。减少以项目申报、成果汇报为目的的形式化会议;支持创办跨学派对话期刊,刊登交锋观点而非共识性论述。二是培育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生态。借助各类媒体平台,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传播宽容失败的理念,以典型案例的表彰和宣传为抓手,扭转社会普遍存在的以成败论英雄的错误认知。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教授)



减少行政性学术评价,缓解年轻教师职业压力

当下,日益增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正成为高校年轻教师工作压力加大进而导致其身心健康受损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些行政性学术评价不仅耗费高校年轻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引发紧张、担忧甚至焦虑等心理问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里的行政性学术评价,泛指那些由上级管理部门、学术组织等行政主体举办的学术评价活动,诸如各级各类人才计划或人才项目以及各种学术名人、学术成果奖项等。由于行政性学术评价的主体拥有行政职权,这类评价及其结果往往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对高校机构及个人的学术地位、声誉和配套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评价因评价主体与被评对象缺乏直接联系而存在固有缺陷。比如,评价指标过于量化,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反映实际价值和贡献。又如,不同项目指标大同小异,容易造成结果相互叠加而失真。总之,行政性学术评价具有高度权威性,只要其存在,就会成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正因为这种评价的高度权威性,更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严格控制数量和规模,防止其作用被泛化和放大。

过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会成为游离于高校教师本职工作之外的另一套评价体系,导致当下的教师评价中存在“评什么”与“干什么”相脱离,乃至“两张皮”现象。按理说,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存在于其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等本职工作中,教师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得到良好的工作绩效,当然,工作绩效包括学术评价。然而现实却是,高校教师对本职业投入多少和质量情况较少得到真正关注,而良好行政性学术评价结果会被“大书特书”。事实上,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行政性学术评价结果。越来越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结果取代了高校对教师本职工作的考评,导致教师需要迎合两套评价体系,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会因两套评价体系标准的冲突而产生困扰。

过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增加了高校年轻教师直接和间接的身心负担,不得不承认,两套教师评价体系对高校年轻教师的影响最大。本质上,行政性学术评价将本应归属于各校管理的年轻教师放到社会层面做比较,这导致高校年轻教师之间产生激烈的学术竞争。绝大多数年轻教师对行政性学术评价避无可避,因为它对年轻教师的学术身份和发展机会影响重大。然而,由于行政性学术评价固有的权威性和局限性,过多的行政评价导致高校年轻教师被裹挟进学术“内卷”的洪流,增加了身心负担。

高校年轻教师的直接身心负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参加各种评价活动的投入。行政性学术评价的标的范围大多宽泛,只要符合条件,大多数年轻教师都会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参加。活虽说得轻松,其实,一旦参加这种竞争激烈的评价活动,前前后后的工作量少不了。同时,年轻教师可能还要为领导、“大牛”参与这种评价承担大量辅助性工作。另一方面,为参加评价活动的平时准备工作。年轻教师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为这种评价而比拼各种论文、课题和奖项等指标成果。这里不是说教师不需要做教研和科研,而是说仅仅为了参加这种评价而产生自己都觉得无意义的“学术成果”,年轻教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心里很憋屈。

高校年轻教师的间接身心负担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评价而在人情世故上花费的精力。年轻教师大多知道要想在各种行政性学术评价中胜出,非学术因素也相当重要。因而,有人会去和关键人物搞关系,有人会在各种学术场合露面,也有人会追求行政岗位。年轻教师为了评价目的而把本该钻研学术的精力花在了人脉关系上,不仅让自己处于浮躁状态,还会给那些不会搞人际关系的教师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为评价中的各种不合理问题而内心苦闷。行政性学术评价容易异化为对教师的“分等级”和“贴标签”,这对落选年轻教师的事业发展很不利,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同时,这种外部评价也容易导致学术不端者或投机钻营者有机可乘,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些问题都会严重挫伤广大教师的学术信仰和工作热情,使他们感到失望,导致心情压抑。

近年来,国家文件多次强调要大幅度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行政性学术评价少了,可以减轻高校青年教师参加这种评价的负担,也可以促使高校管理者更多地担负起评价与管理年轻教师的主体责任。对任何人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是一种享受。高校年轻教师大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成才意识,高校管理者要将教育和科研“良心活”的特点体现在对年轻教师的评价与管理中,不简单以“数数字”“量化指标”为考核标准,要以调动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考评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年轻教师营造有利于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制度与环境,缓解高校年轻教师的职业压力和身心负担。